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集刊编辑委员会 编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哲学学部集刊(2014)

哲学、宗教学与语言学卷

CA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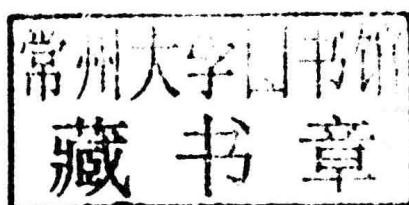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集刊编辑委员会 编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哲学学部集刊 (2014)

## 哲学、宗教学与语言学卷



CAS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集刊·2014·全2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集刊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097 - 8330 - 6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文史哲 - 中国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1525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集刊(2014)(全2卷)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集刊编辑委员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编辑 / 范 迎 周志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8.25 字 数: 764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330 - 6

定 价 / 268.00 元(全2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集刊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江蓝生

副主任：李景源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克立 叶秀山 刘丹青 江蓝生 汝 信  
李景源 杨 义 沈家煊 陆建德 陈众议  
卓新平 黄长著 黄宝生 朝戈金 谢地坤  
魏道儒

# 前言

江蓝生

为了促进学科交叉、更好地整合相关学术力量，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6年8月成立了学部，下设文史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研究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等五个学部。文史哲学部涵盖了我院文学、史学、哲学三大学科，其中文学学科包括中国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国文学以及汉语语言学等学科；史学学科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边疆历史地理、中国考古、世界历史等学科；哲学学科包括哲学与宗教学两大学科。学部成立后积极履行学术指导、学术咨询和学术协调的职能，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活跃了院内外的学术空气。

2007年，文史哲学部决定每三年编辑一次本学部的集刊。2008年，文史哲学部编辑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集刊》，选收我院相关学科学者发表的优秀论文，以集中展现我院文史哲学科最新、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进行了机构调整，设立历史学部，原文史哲学部更名为文学哲学学部。机构调整后，文学哲学学部决定继续编辑出版学部集刊，定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集刊》（以下简称《集刊》）。《集刊》分为2卷，第一卷为文学卷，第二卷为哲学、宗教学与语言学卷。

《集刊》每三年出版一集，选收论文发表时间范围为编辑年份以前的三年，本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集刊》选收时限为2011~2013年期间发表的论文。为了保证《集刊》的质量，成立了《集刊》编辑委员会，由文学哲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和相关研究所所长担任编委；确定了严格的编选程序，由研究所推荐，编委会审定篇目。在初选论文的取舍过程中，编委们根据本《集刊》所收论文应该有创新见解，理论深度，学术新意，最好应具有学术示范意义的标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工作对保证《集刊》应有的水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谨在此对编辑部诸同志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示敬佩与感谢。

2015年6月23日

# 目 录

## 文学卷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	张 炯 / 001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问题意识及其提问方式	党圣元 / 032
“进步”与“终结”：向死而生的艺术及其 在今天的命运	高建平 / 048
孔子的力量	
——诸子还原的一条被遮蔽的思路	杨 义 / 069
兰亭雅集与魏晋风度	刘跃进 / 086
元诗叙事纪实特征研究	杨 镛 / 105
言说与伦理践行之间	
——明清之际士大夫与夫妇一伦（之一）	赵 园 / 121
王渔洋“神韵”的审美内涵及艺术精神	蒋 寅 / 148
“遗老”眼中的辛亥革命	程 巍 / 175
评莫言	陈众议 / 202

## 个人化叙事与中国化故事

- 2012年长篇小说概观 ..... 白 烨 / 217  
 约翰·弗里与晚近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走势 ..... 朝戈金 / 230  
 论埃和里特—布拉嘎特英雄史诗 ..... 仁钦道尔吉 / 245  
 史诗的文本形态与异文研究的问题取向：以“勒俄”的  
     语义学解诂为主线 ..... 巴莫曲布嫫 / 262  
 苏格拉底与摩吕草

-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引荷马史诗考 ..... 贺方婴 / 300  
 梵汉对勘神通游戏·导言 ..... 黄宝生 / 318  
 波斯“诗歌神授”观  
     ——兼与柏拉图“摹仿说”之初浅比较 ..... 穆宏燕 / 336  
 自我的风景 ..... 陆建德 / 350  
 荷尔德林：重建神话世界 ..... 李永平 / 361  
 普里什文的思想史意义 ..... 刘文飞 / 377  
 作品的“开放性”与“文本的权利”  
     ——试论埃科的文学作品/文本理论 ..... 周启超 / 391

## 哲学、宗教学与语言学卷

## 中国哲学要观照时代的发展

- 在“中国哲学论坛（2011）”闭幕式上的讲话 ..... 李景源 / 403  
 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 ..... 陈筠泉 / 4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 ..... 徐崇温 / 417  
 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观念及其发展路线  
     ——在这种视野中关于“存在”的一些理解 ..... 叶秀山 / 427  
 深化中国学术视野中的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研究 ..... 姚介厚 / 441

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手稿》	梁志学 / 457
从曲高和寡到主流话语	
——张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历史命运	方克立 / 475
精义穷理 通变知常	
——如何应对 21 世纪大变革时代的几点启示	李惠国 / 490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商业道德的若干理论问题和	
实践问题	谢地坤 / 503
徐光启：放眼看世界的先驱	卓新平 / 516
“周易”的智慧在于“和谐”	余敦康 / 529
佛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魏道儒 / 536
韩国曹溪宗创始人知讷禅师及其禅法	杨曾文 / 540
中华珍本宝卷·前言	马西沙 / 552
巴布宗教思想述要溯源	吴云贵 / 566
读汉译《昭元秘诀》	金宜久 / 574
南传佛教与佤族社会生活的“阶序”逻辑	
——以云南临沧佤族为例	郑筱筠 / 588
汉语连一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	江蓝生 / 599
名词和动词：汉语、汤加语、拉丁语	沈家煊 / 632
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	刘丹青 / 650
双音化的名词性效应	张伯江 / 673
“法”字古文音释	
——谈鱼通转例说之五	孟蓬生 / 689
关于语法演变的机制	吴福祥 / 706
目的构式“VP 去”与 SOV 语序的关联	杨永龙 / 727
汉语辞书中的字头附列字问题	程 荣 / 750

# 中国哲学要观照时代的发展\*

——在“中国哲学论坛（2011）”闭幕式上的讲话

李景源\*\*

各位领导、各位学者：

大家好！

“中国哲学论坛（2011）暨第二届中国哲学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海南省委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和海口市人民政府承办，并由哲学界12个一级学会协办，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这次“中国哲学论坛”包括了哲学所有的二级学科，是全学科的学者同仁们展示璀璨学术成果的群英大会，也是中国哲学界站在民族复兴的高起点上繁荣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事业、不断开创中国哲学新境界的誓师大会。听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我想就此谈几点感想，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第一，“中国问题”应该也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界普遍关注的中心课题。

与会者的论文和发言给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各学科都转向了“中国问

\* 本文原刊于《哲学动态》2012年第3期。

\*\* 李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副主任，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题”研究，预示着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众所周知，越是在大的历史变动时期，哲学的功能就会表现得越为明显。抗日战争初期，许多哲学家们的注意力一起转向了中国问题，如金岳霖、冯友兰等学者讨论的焦点便是“中国会不会亡”。大家当时一致认为，中国决不会亡，因为中国厚重的思想文化积淀不会消亡。在救亡图存的激励下，众多学者奋力著书立说，把中国的哲学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涌现出一批泰斗级的人物。改革开放伊始，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再次彰显了“哲学是解放思想的利器”这一功能。伴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翻天覆地的变革，哲学研究也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一个从复兴到繁荣发展的良好时期。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已跻身于世界重要影响国之列，国外对中国的关注度也空前提高。据美国媒体分析企业“全球语言研究所”统计，“中国崛起”“中国道路”是10年来全球最热门的新闻主题。中国的快速崛起激起了西方某些国家非理性的和情绪化的反应，美国的霸权主义言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过激表现表明，中国进入了一个与西方进行价值观对话的新时期。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自觉地走进国际学术讲坛，从哲学的层面向世界阐明中国的价值体系，这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国际空间。

第二，中国哲学界强烈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在本次论坛得到了充分体现。

有的学者在谈到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重点谈到了对当前哲学研究状况的危机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集中精力做的一件事就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探索。丰富的社会实践对哲学界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哲学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跟上时代步伐，就要对这一伟大实践探索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做好哲学概括和提炼工作。经过30多年的讨论和研究，我们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这个工作做了没有，做了多少？是否形成了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话语？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转型条件下的理论合法性问题。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尤其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要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据统计，中国每年出版图书近30万种，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在浩如烟海的

书籍、报刊中，有多少东西是独立探索出来的？有创造性的和有创新性的东西到底有哪些？能在世界哲学研究领域站得住脚并产生反响的又有多少？哪些研究成果能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学者们反躬自省。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哲学研究存在着泡沫化的虚假繁荣的现象，存在着形式创新大于内容创新的表面深刻的特点，即宣传性的东西多、探索性的东西少；现象罗列的东西多、思想创造的东西少；依循文件讲套话的东西多、有现实针对性和原创性的东西少。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科学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哲学的进步总是把研究者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者对自身理论的自我批判作为发展的内在环节。由此我们看到，通过这种反省意识的增强而产生的理论危机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甚至整个中国哲学界寻求哲学研究发展和突破的主体条件。

第三，当代中国哲学界研究范式多样化、个性化日益彰显，预示着人才辈出的时代即将到来。

尽管在当前中国哲学界迷信洋人和古人、照抄照转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趋势是已经进入一个“后经学时代”，哲学研究者们也有了一种哲学自省和理论自觉，认识到要更加从容地分析和阐释以往一切哲学成果，注重发掘其中的历史价值，接着经典讲比照着讲更得人心。从本次论坛发布的众多研究成果即可见一斑。我们知道，自主研究、着眼于创新、写出带有个体独特性的哲学作品是五四运动以来众多哲学大师秉持的学术传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学术品格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是陈寅恪一生所秉持的学术品格和要追求的学术境界。冯友兰先生一生怀抱“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使命感，为学术立命，为真理守望，其间虽历经曲折，但痴心不悔，终于为后人留下了“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传世作品。因此，哲学家要做时代的思考者，把握时代深层次的课题，关键还要抓住自己内心产生的理论困惑，并以此为基点踏上思想探索的征程。这样产生的理论成果才有可能是独创的、有个性的，也才会促进和繁荣哲学的多元化发展。记得曹禺先生曾经说过，要写他的传记就是要写出他心中的苦闷。所谓“我手写我心”，就是要关注和解决心中的困惑，这恐怕是天底下想做学问的人都有的感受。20世纪末，胡绳先生曾经写过一幅《八十自寿铭》，其中有“吾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有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的语句，还用“天命难知频破惑，尘世多变敢求真”的诗句来总结自己的学术经历。他经过 30 年的不懈探索，对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终于达到了一种豁然独醒的境界，创造了其晚年的学术辉煌。现今，“我手写我心”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学术抱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哲学是最贴近人心的事业。听从心中的召唤，解决心中的疑惑，这是理论自觉的重要标志。

第一届中国哲学大会的主题是“新世纪的哲学与中国”，当时列了 3 个分题目“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哲学创新与当代中国发展”，与会者以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觉悟和使命感，深入地思考和讨论了下述问题，即：全球化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哲学？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是什么？哲学观念的变革要求哲学家最需要坚守的东西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建构新时期的中国哲学新形态具有重大意义。下面，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建议，供大家参考。

首先，关注全球化时代变迁和世界发展趋势，从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道路的视角重新确立和增强哲学的问题意识，重新认识拓宽理论视野和实现哲学范式转型的重大意义。

我们知道，每一时代的哲学都以自己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为出发点。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由区域性国家变为全球性国家，中国的发展正在日益改变国际关系的格局。自觉地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从世界历史的总体联系中，真切地把握中国在世界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哲学问题意义重大。中国道路的探索始于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在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交往中逐渐成形的。始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告诉我们，此次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和经济危机，还是西方主导的现代性的文明模式的可行性的危机，更是价值观的危机即哲学的危机。中国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探索出一条有益于人类的新的文明道路和形式，是当今中国哲学面临的根本问题，它比 100 年前中华民族面临的救亡图存、推翻三座大山的使命还要伟大和艰巨。

我欣喜地看到，在这次论坛上，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学者都表示要以回

应中国发展面临重大问题为立足点和参照系。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往往渗透着国际因素，是中国化了的世界问题。因此，要找到中国自己的理论问题，也要参照国外在想什么、在关注中国什么。经验表明，外国对中国的评价和推测的主要根据都是从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着眼的，无论是早期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还是近期的“中国发展前景不确定论”，都是根源于和立足于他们所理解的中国价值观。如前英国首相撒切尔认为，中国缺少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崩溃。德国前总理也认为，中国只能向世界输出产品，但不能向世界提供思想，不是真正的世界级大国。美国主流媒体也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根深蒂固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思想体系，后一条理由是“中国发展前景不确定论”的基本依据。国外政要、学者、媒体记者对中国模式各种不同的解释和歪曲，说明他们还未真正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真实含义和精神实质。实际上，随着中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发展中国家提出“向东看”的问题，西方也更加关注中国在想什么、做什么。

最近，西方媒体又有了一番新的论调，认为中国重新像数世纪前那样成为全球经济头号强国的日子已为时不远，资本主义遇到了自两极体系时代以来最尖锐的意识形态危机，为此西方要实现资本主义的自救，建立能与中国抗衡的新西方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特别关注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既是理所当然也是大势所趋。在这种复杂的全球格局调整和意识形态对抗中，中国哲学要关注时代的发展，势必就要关注国外学者向中国学者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其中许多都是关涉制度形式和价值观体系的重大理论课题：其一，有关“中国的理论与苏联的理论有何不同”就是近年来我们经常会碰到的问题之一。解答了这一疑问，便可以揭示出中国是如何通过改革开放从而避免了传统社会主义危机的秘密。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立国之本。1989年5月，邓小平曾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头号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是否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划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事实上，西方思想领域一直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和瓦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把苏东模式的失败归结为整个社会主义的死亡，以此来证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争已经结束。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增强理论的说服力。这是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理论任务。其二，“搞了市场经济，还有没有社会主义？你们靠什么战胜资本的逻辑？”这也是令国外学者困惑的问题，提出“世界体系论”的沃勒斯坦就明确表示自己对中国的认知陷入矛盾之中，其中首要的就是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捉摸不定。这个问题提醒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生存和发展，再一次成为摆在哲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三，“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们还有什么？”也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国外学者认为我们的各种媒体对类似上述问题的解读和回答过于笼统，他们总是追问，你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21世纪的中国秉持何种价值观？之所以纠结于这些问题，一方面缘于他们始终认为西方固有的价值观才具有合法性，基于这种优越感和强势思维，他们从未放弃把世界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都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中心，也反映了他们试图走出金融危机、挽救西方价值观危机的一种理论思考。当然也应该承认，这些问题更是中国哲学界需要努力加以解决的课题。只有紧紧抓住人们心中的困惑，才能进行实质性讨论。

其次，加强实践的理论层面的提升和现实的思想层面的建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重新总结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得失，进一步探索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路径，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境界。

2004年，我曾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版本（新哲学的实质系统），如何自觉地将之理论化、形成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形态，是中国哲学界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与中国化是同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跟上时代，就要以哲学的方式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做好理论提升的工作，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实质性的内容。然而，近年来的讨论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主要还停留于一种“中国化史”的描述阶段，打外围战的多（讨论必要性、方法论的多），实质性的成果少，其成果尚无法进入哲学原理的层面。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承认并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

性，但真正进入这个领域并以此为志业的人并不多，还处于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因此，需要沉下心来认真思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为什么不能进入学术主流”这个令人关切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现实问题为中心展开理论研究的学科，它既有思想性学科的属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中国化”的实质是理论与现实、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化”的问题才有希望。

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化”问题本身还存在着相当多的误解，有人认为“中国化”本身是伪命题，也有人认为坚持中国化的方向就是坚持特殊主义。这些认识问题不解决，中国化的问题很难深入下去。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它涵盖和贯穿中、西、马哲学发展的整个历程。从晚清的“中体西用”、中间经过“别共殊”和毛泽东的“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论”、一直到目前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讨论皆可以为证。“中国化”这一概念很明确，就是把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然而，在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上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个概念是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事实上，从大量论述可以看到，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是引导我们从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的视角来对待外来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创立 150 多年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意思是说，苏联和东欧各国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在苏联模式影响下，我们也一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思考问题。如果说马克思在 19 世纪已经将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社会主义了，那么后来的人们又因为教条主义理解把它又重新变为空想的了。因此，邓小平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但一定要符合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倾向是，有人不时对“中国化”和“中国特色”提出质疑，这表明在当前普及历史唯物主义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具体历史实践出发的唯物主义，就是从具体条

件下的事物出发的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毛泽东有很透彻的把握。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段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列宁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邓小平更是曾多次强调，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考虑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当前，我们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唯物史观不仅为民主革命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合理性的论证，而且为近代以来所争论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历史观基础。提出“中国化”和“中国特色论”，其要义是既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又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而主张坚持普遍与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原则。

34年前，邓小平同志在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时预言，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重申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要建设文化强国其基础是学术大国，其核心是哲学大国。大者不是大楼之谓也，而是大师之谓也。我相信，本届哲学大会必将推动哲学研究全面发展，中国哲学事业必将人才辈出、群星灿烂。